

文脉所钟 |
从临高村走出的
末代举人

郑绍材的人生,起点在宁远河西北岸的崖州五都临高村(今三亚市崖州区临高村)。这里河网交错,是保港片区进出的咽喉,自古就不算闭塞。他家老宅,是一座带点南洋风味的骑楼,当年挂的招牌叫“嘉祥铺”,是做买卖的地方。这很有意思。一个后来通过正统科举出身的人物,家族根基却扎在商贾往来之中。

郑绍材,字华千,号贞山,生于清朝光绪二年(1876年)。他走的是那时所有聪明孩子最经典的路:读书,考功名。他走得相当顺,年纪轻轻,就在州试拿了第一,府试拿了第二,轻轻松松成了秀才。

真正的爆发在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,庚子事变后朝廷补行恩科乡试。那一次考试,用今天的话说,是“地狱难度”,但25岁的郑绍材不仅考中了,而且成绩单相当亮眼:崖州第一名,海南第二名,广东第一百二十名。这份成绩,让他头顶多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头衔——崖州历史上最后一位正儿八经考出来的举人。他考举人时写的文章《规矩方圆之至也》居然留了下来。

今天我们看八股文,或许觉得刻板腐朽,但当时的主考官唐镜沅给的评语是“水流花放,一片神行”。意思是说,在严苛的格式枷锁下,他的文章写得自然流畅,道理讲得通透。这至少说明,在旧式教育的评价体系里,他是个顶尖的优等生。中举,意味着拿到了进入官场的入场券,他被选为崖州、万宁等五属的谘议局议员。

然而,历史的玩笑来了。1905年,清朝一道诏书,把运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给废了。郑绍材和无数像他一样的举人,瞬间成了“旧时代的遗存”。为了谋个前程,他不得不北上京城,参加专门为这些“遗存”举办的“拣选”考试,捞到了一个“州判”的候选资格。可以想象他那时的心情,刚刚挤过独木桥,登上彼岸,却发现脚下的土地正在裂开。他是一只脚留在旧时代,另一只脚,不得不试探着迈向那个谁也看不清的未来。

宁远河上的书生样本

末代举人郑绍材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佳琪

在三亚崖州,人们记得一个名字——郑绍材。他这辈子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、足以载入全国史册的大事,但在崖州这片土地上,他的人生轨迹却像一把钥匙,能打开一扇理解清末民初海南地方社会的大门。他是崖州科举史上的最后一个举人。这个名头,听起来像是一曲辉煌的终章,但对他个人而言,更像是一道人生岔路口的鲜明标牌——前面是延续千年的、清晰却即将崩塌的士大夫老路;身后是汹涌而来的、陌生而又喧嚣的新时代浪潮。他就是在这样的夹缝里,用自己一生的步履,写下了一个传统书生如何应对变局、服务乡土的样本。他的故事不大,却足够真切,像崖州古城墙上的一块砖,仔细看,能看到一个时代的纹路。



崖州区临高村铺仔市路口的骑楼群,最左侧有围挡的即为郑绍材故居。



俯瞰临高村(临高村是郑绍材人生的起点)。

临危受命 | 乱世中的崖州掌印人

进入民国时期,天下并没有立刻安定下来,尤其是海南这种偏远的地方。乱世,往往需要能稳住局面的人。郑绍材的学问、声望和务实能力,让他几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。他当过崖县议会议长、团练局长。而最能体现其分量的是在1916年和1918年,当时县里的知县、知事一看形势不好,竟两次“挟印潜逃”,扔下一个烂摊子。衙门空了印,地方就乱了套。这时候,大家伙儿一合计,公推郑绍材出来“权理县篆”,代理知县。这不是什么美差,而是个火坑。但他接了。时人评价他“无论是在官、在野,凡一切地方公益,见义勇为”。他主政后,干了一系列实事:革除积弊、恢复学田公款、购置公田、修缮族谱……桩桩件件,瞄准的都是地方治理的顽疾和老百姓的生计。最能体现他胆魄和想法的,是1918年他主持刻立的那块《崖县公署碑》。这块石头现在藏于三亚博

物馆里,是一份充满火药味的官方告示。碑文开头就火力全开,痛骂“清署积弊,千孔万疮”,然后一条条列出从前那些房吏、粮役是怎么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的,“现耗费”“开征费”“承管费”……名目多达十几项。郑绍材联合地方乡绅,顶住压力,向上级据理力争,最终获得广东省财政厅批准,把这些“陋规”彻底废除。更绝的是,他把废除陋规后,政府到底该按什么标准收税,白纸黑字刻出来公之于众。从民丁税、黎丁税,到田赋、渔课、盐课,一共十一项,每项收多少钱,写得明明白白。他刻这块碑,就是想“垂之久远”,让改革成果不能轻易被后来的官推翻,让老百姓心里有本明白账,让贪吏无从下手。在那样一个混乱的年代,在一个偏远的海隅,他想用一块石头的力量,建立起一点透明的、持久的秩序。这份心思和勇气,比他的举人头衔更值得书写。

功泽桑梓 | 存续文化的火种

如果说理政是“立功”,那么郑绍材对崖州乃至海南最大的贡献,在于“立言”,在于为后世存续了文化的火种——刊印《崖州志》。早在光绪年间,知州钟元棣就主持重修了《崖州志》。但这本耗尽心血的地方史志巨著,却因为没钱,一直没能印刷出版,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,随时可能散佚湮灭。民国三年(1914年),郑绍材和乡绅孟继渊等人谈起此事,痛心疾首,决定“幸具同心”,一定要把它印出来。最难的是钱。郑绍材自己带头捐,还到处“化缘”,“商诸大众”筹款。钱凑得差不多了,他做了一个更关键的决定:亲自带着珍贵的手抄本,远赴广州去安排铅印。在广州的几个里,他干起了最枯燥也最关键的活儿——校勘。“版初出,其误点悉为校正”,他逐字逐句地校对排印出来的版样。1914年,一百套崭新的铅印本《崖州志》终于问世,并“分饷州人”。这套书,成了后来所有《崖州志》校勘、研究的祖本。郑绍材在跋文里欣慰地写道:“窃喜此书印刷既观厥成,流传自当永久。而后生考古,不致兴文献不足之嗟。”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:不是在印一本书,是在抢救一个地方的集体记忆。

1921年,郑绍材去世,年仅四十五岁。家族后人认为,他的早逝与多年“操劳过度”有关。为他撰写墓志铭的,是民国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区大原。铭文里有两句评价很中肯,说他在议会里“固不肯为庸庸者”,一生“义务为重,权力为轻”。更将他比作崖州特产:“珠之产崖也,为南海之精。君之生于崖也,为多士之英。”乡人们私底下赠他一个谥号“文正”。这是中国士大夫身后所能获得的极高褒奖,虽非官方钦定,却代表了乡土社会至高的认可。他的墓志铭,后来被收入了《崖州古文百篇》。

郑绍材的一生,是典型的“乡贤”轨迹。他的舞台,从来就不大,始终在崖州这一方水土。他不是革命者,没有掀翻旧世界的蓝图;他也不是保守的遗老,死死抱住过去不放。他更像一个务实的修补匠和忠诚的守护者,当旧秩序崩塌时,他努力用自己所学、所能,去填补权力的真空,稳定社会,革除弊政;当文化记忆面临断裂时,他不惜心力,奔走呼号,为其续命。他的一生,就像他故乡宁远河水映出的鸿雁影子,是旧式士绅那种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责任伦理,在新时代的艰难投射。



郑绍材像。△生成

郑绍材(1876年~1921年),字华千,号贞山,崖州五都临高村人,清光绪庚子辛丑(1901年)恩并科举人,为崖州最后一位科举制举人。民国初年任崖县议会议长、代理知事,主政期间革除积弊、复办学款,推动了地方治理与教育发展。其毕生重要贡献在于组织刊印光绪《崖州志》,于1914年亲携善本赴广州铅印成书,使该地方志得以保存传世,被誉为“急公兴学”的典范。(杨道 辑)